

出处殊途, 治生迥异

——陆陇其与吕留良出处及治生比较

张猛¹

(嘉兴学院师范学院, 浙江 平湖 314200)

【摘要】: 因各自家族在明代的境遇及明清易代之际的个人经历的不同, 陆陇其与吕留良出处殊途, 治生迥异, 进而导致两人及各自家族在清代中后期的不同遭遇。陆陇其治生途径是处馆、书院授徒, 兼以务农、时文评选和刻书。吕留良治生途径是时文评选、刻书, 兼以务农、行医。陆陇其与吕留良是清初嘉兴士人中最典型的人物之一, 通过他们的比较, 对深入认识清初士人具有重要意义。

【关键词】: 陆陇其 吕留良 出处 治生

【中图分类号】: I206. 48 **【文献标志码】:** A **【文章编号】:** 1671-3079(2020)02-0014-06

清雍正二年(1724), 陆陇其(1630-1693, 原名龙其, 字稼书, 浙江平湖)从祀孔庙, 成为国家倡导的典范、享誉士林的圣人。其后人自孙辈起, 或为府县学生, 或为奉祀生员, 虽不甚显达, 却也耕读传家, 香火不断。五年之后的雍正七年(1729), 有清一代的最大文字狱“吕留良案”发生。第二年底, 经刑部会审, 已死多年的吕留良(1629-1683, 字用晦, 号晚村, 浙江桐乡人)及长子吕葆中被判剖尸枭首、著作被销毁, 幼子吕毅中被判斩立决, 财产充公, 其余家人被判流放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。短短几年之内, 陆陇其从祀孔庙, 荣耀至极, 福泽子孙; 吕留良剖尸枭首, 祸及子孙, 悲惨至极。同为清初大儒、“尊朱辟王”运动代表人物, 陆陇其与吕留良身后遭遇却走向了两个极端, 反差之大令人震惊。何以如此? 以下, 笔者从两人的出处及治生谈起, 进行初步探究。

一、清之官员与明之遗民: 陆陇其与吕留良出处比较

“出处”是古代士人比较纠结的问题。“出”分两类, 一类是“出”以“荣身”; 一类是为“道义”而“出”。“处”亦分两类: 一类是把“处”作为一种手段, 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好的荣身之径; 一类是把“处”作为一种消极不合作的方式, 表达对当权者的不满。^[1]古代士人对“出处”的认识及选择, 受制于时代、家族和学术等多种因素, 而他们的出处, 对士人本身及其家族又起着反作用。

清康熙前期, 伴随着三藩之乱的平定和台澎诸岛的收复, 社会趋于稳定, 经济逐步恢复, 清廷也自上而下执行了崇儒重道的政策, 采取了诸多拉拢士人的手段, 通过科举考试以及博学鸿儒特科等招揽了朱彝尊、汪琬、毛奇龄、施闰章等一大批士人。此时, 前明王朝已无复国之可能, 整个社会处于一种人心思定、百废待兴的良性状态。讨论处于此种境遇之下的陆陇其与吕留良的出处, 并通过他们了解彼时士人的出处, 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。

陆陇其是唐代宰相宣公陆贄之后, 世居浙江之当湖, 明宣德五年(1430)平湖建县, 遂为平湖人。陆陇其七世祖陆溥曾任江西丰

¹基金项目: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(14BZX047)

作者简介: 张猛(1982—), 男, 山东邹平人, 嘉兴学院师范学院讲师, 文学硕士, 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、明清思想文化。

城县丞,为人正直刚强,为官清正廉洁,留下了“三鱼堵漏船”的故事。陆溥之子由陆氏旧居尚义坊迁到泖口,筑起三鱼堂。陆溥之后,三鱼堂陆家几代人耕读传家,但未有出仕为官者。陆隲其伯父陆灿,明崇祯七年(1634)进士,初授济南府推官,以廉洁正直自励。崇祯十二年(1639),清兵攻破济南,陆灿以死殉节。崇祯三年(1630),陆隲其生于泖口三鱼堂。少时,其父陆元教导他说:“居官不入党,秀才不入社,便有一半身份。”“贪与酷,皆居官大戒,然贪而酷,人皆知恶之。若自恃廉谨,而刻以绳人,人慕其风节,竞相仿效,祸不可言矣。”^{[2]283}陆隲其传承清正廉洁家风,秉承笃实务本庭训,入仕后以正直清廉自励。

清顺治十三年(1656),陆隲其补平湖县学生员;康熙五年(1666),中浙江乡试第九名举人;康熙九年(1670),赐二甲第七名进士出身;十四年(1675)四月,选授江南嘉定知县,七月赴任,以“锄豪强、抑胥吏、禁侈靡、变风俗”为主,深得嘉定县民爱戴;十六年(1677)二月,因“讳盗”罢官,离任时,行李中唯有图书数卷和织机等物,嘉定九乡二十多万男女执香携酒为他送行,又建生祠纪念;二十二年(1683),出任直隶灵寿知县,勤政爱民,政绩卓著,得到灵寿县民和朝野有识之士的一致称赞;二十九年(1690),升任都察院四川道试监察御史,因屡次上疏得罪权贵,部议不称职,遂弃官返乡;三十一年(1692)十二月底病逝。

吕留良祖上靠世代经商及投资土地获取了巨额财富,其曾祖吕相官至沔阳州通判,后致仕归里,“以货豪于乡里,御倭寇,输粟筑城,所费独多”,“致仕归,力为善,老而弥笃”。^[3]吕相子三人吕焕、吕炯、吕燠。吕焕官至山西行太仆寺寺丞,子吕元启,官至鸿胪寺丞。吕炯官至泰兴知县。吕燠尚明宗室淮庄王长女南城郡主,后与南城郡主辞去岁禄回到崇德,是明代第一位尚主得归之人,民间因此称崇德吕家是“吕駙马家”;吕燠子二人吕元学、吕元肇,两人皆不是南城郡主所生。吕元学曾任繁昌知县,子五人大良、茂良、愿良、瞿良、留良。

吕留良是吕元学遗腹子,小妾杨氏所生,出嗣吕焕之子吕元启为嗣。吕留良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,曾在澄社、征书社等文人团体中获良好声望。清军进逼江南时,吕留良毁家纾难,与好友孙爽、侄子吕宣忠等人参加太湖义军,失败后隐居乡野。顺治十年(1653),为逃避仇家迫害,吕留良被迫应试成为邑学诸生。吕葆中《行略》:“癸巳始出就试,为邑诸生,每试辄冠军,声誉籍甚。”^{[4]198}康熙五年(1666),吕留良因拒不参加县学考试被革去诸生身份,回到南阳村,与他相处多年的刘宗周弟子黄宗羲等诗文友离他而去;不久之后,刘宗周的另一弟子张履祥来到吕留良身边。吕留良在张履祥的指导和帮助下开始了“尊朱辟王”大业。然而,吕留良并没有被清廷遗忘。康熙十七年(1678),朝廷征召博学鸿儒,浙江当局推荐吕留良,吕留良誓死拒绝。康熙十九年(1680),朝廷征召山林隐逸,浙江当局再次推荐吕留良,吕留良闻知后当即吐血晕厥,无奈之余在病榻上削发出家,隐居吴兴妙山风雨庵。康熙二十二年(1683)六月,吕留良自吴兴妙山风雨庵回到崇德南阳村庄,八月中旬逝世。

由以上分析可知,就两人主要身份来说,陆隲其是清之官员,吕留良是明之遗民。

二、处馆、书院授徒与时文评选、刻书:陆隲其与吕留良治生比较

陆隲其与吕留良同为清初浙江嘉兴府人,且年岁相当、学术志趣相同。康熙十一年(1672)五月,陆隲其与吕留良会于嘉兴,讨论了当时士人普遍关心的学术人心问题。吕留良死后,陆隲其在《祭吕晚村先生文》中写道:“隲其不敏,四十以前,亦尝反复于程、朱之书,粗知其梗概。继而纵观诸家语录,糠粃杂陈,珣玞并列,反生淆惑。壬子癸丑,始遇先生,从容指示,我志始坚,不可复变。”“所不能尽合于先生者,程明道有云:‘一命之士,苟存心于利物,于人必有所济。’斯言耿耿,横于胸中,遂与先生出处殊途。”^{[2]301}累世官僚、家资丰厚的崇德吕家与世代业儒、耕读传家的泖口陆家,因家族传承情况和家风之不同,导致两家子弟在明清易代之际的出处选择有很大不同。清之官员陆隲其与明之遗民吕留良出处殊途,治生迥异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

“治生”意为“经营家业”“谋取生计”,最早见于先秦稷下学派论著《管子·轻重》:“出入者长时,行者疾走,父老归而治生,丁壮者归而薄业。”治生主要是指通过处馆、游幕、授徒、书画、刻书、行医、问卜、务农、经商等多种手段谋生。明清时期,随着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,士人思想观念日趋开放,尤其是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江南一带,士人思想观念有了很大的解放,传统“士农工商”阶层划分意识有所松动,张履祥“四民异业而同道”的新观念为士人“治生”提供了理论依据。陆隲其非常重视治生,他认为:“农工商贾是其本业,不可谓之俗物。”^{[5]116}他在读汪琬《钝翁类稿》“古之君子,力耕以为食,力蚕以为衣,俯仰

身世,无求而皆给,故当其不得志而退也,毕其生可以无闷。

今之君子,仰无以养其亲,俯无以畜其妻子,饥寒之患,迫于肌肤,此其时与古异矣。当不得志,其能遁世长往,浩然于寂寞之滨哉?吾以是知其难也”一段时,禁不住大发感慨地说:“读此一段,不觉为之慨然,不得不令人思许鲁斋‘治生为急’一语。”^{[5]137} 吕留良诗文中也多次提到了治生。他在《祭钱子与文》中写下了遗民生活的艰难:“如今之遗民,为要路谒客以呈身,或捉刀怀,为幕府之宾。最下则含乳乎南宗,开堂卖拂,此其家亦可以不贫。奈何三尺之篱,数十竿之竹,蔽影于九曲之村。”^{[4]174-175} 吕留良被革去秀才功名后,深感生存压力巨大,他在《与潘美岩书》中说:“某年来乞食无策,卖文金陵,僦寓布家,自鬻自刻。”^{[4]54} 他甚至起草了一份《卖艺文》,开列润笔价目单,详细标注了册页、诗文、扇面、祭文或碑记等价格。

入清以后的陆陇其与吕留良因为家庭生计和交游、藏书等需要,开始了多重的治生活动。陆陇其的主要治生途径是处馆、书院授徒,兼以务农、时文评选和刻书。吕留良的主要治生途径是时文评选、刻书,兼以务农、行医。此外,陆陇其、吕留良还就书画、经商、游幕等治生途径有所论述。

(一)关于“处馆、书院授徒与治生”

陆陇其认为“砚田恒产”,他从二十岁时开始处馆,晚年在泲口设立尔安书院授徒,终其一生,除十年为官外,主要以处馆、书院授徒为生;吕留良也曾梅花阁中教授子侄读书。清顺治七年(1650),陆陇其在嘉善蒋玉宣家做塾师;顺治八年(1651)到十年(1653),在嘉善李荆朴家做塾师;顺治十一年(1654)到十六年(1659),在嘉善李炜家做塾师;顺治十七年(1660)到康熙元年(1662),在松江周孟韬家做塾师;康熙二年(1663)到八年(1669),在平湖倪钟瑞家做塾师;康熙十七年(1678)、二十年(1681)到二十二年(1683)、三十一年(1692),皆在常熟席启寓家做塾师,康熙三十一年(1692)二月开始经办尔安书院,年底病逝。陆陇其有 25 年的时间在嘉善、松江、平湖、常熟等四地,在蒋玉宣、李荆朴、李炜、周孟韬、倪钟瑞、席启寓等六家担任塾师,在平湖倪钟瑞家时间最长,长达七年,在常熟席启寓家次数最多,多达三次。

相比处馆,陆陇其书院授徒的时间就少多了,仅在泲口尔安书院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。处馆期间,陆陇其从秀才到举人再到进士,在科举之路上顺利进阶。中进士后,陆陇其先后担任了江南嘉定知县、直隶灵寿知县和都察院四川道试监察御史,约有 10 年时间。担任灵寿知县时,陆陇其在处理政务之余,曾多次到灵寿县学讲授四书,与诸生约定《讲书条约五则》,所讲文稿后来编订为《松阳讲义》。处馆、书院授徒是陆陇其治生的主要途径,即使在做官时,他也不忘教书育人。相比陆陇其,吕留良的处馆就简单多了。顺治十八年(1661),吕留良在兄长吕茂良的督促下,辞去社集、时文评选及刻书等事,在崇德城西门内祖宅友芳园之梅花阁教授子侄和门人弟子读书,为此,他还设立了《梅花阁斋规》。吕留良曾先后邀请黄宗羲、张履祥来家处馆,有效提升了吕氏家塾的学术品质和文化品位。

(二)关于“时文评选、刻书与治生”

陆陇其与吕留良都曾从事过时文评选和刻书,陆陇其偶尔为之,吕留良则把时文评选和刻书当作主业来做。吕留良是与艾南英、陈子龙齐名的时文评选名家。他的时文评选经历分为两个阶段:前期,顺治十二年(1655)到十八年(1661),应他人之邀而从事时文评选,主要是排解因出处节义的困扰而造成的内心空虚;后期,康熙五年(1666)到十二年(1673),因放弃诸生后治生之所需,当时吕家人口繁多,需要拓展治生渠道,而时文评选及刻书可以给吕家带来充足财力。

为了摆脱书商在评选时限、篇幅和评语体例等方面的制约,吕留良在家中开设了天盖楼书局,自行刊刻自选时文,并到全国最大贩书市场之一的南京承恩寺书坊等地出售所刻图书。为此,吕留良自己到过南京,又派儿子吕葆中等到南京经营图书,同时采集刻板所需图书,后又派吕葆中到福建开拓图书市场。在吕留良的精心经营下,崇德吕家刻书生意繁荣,卖一批书可达四千金,而且经常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。

吕留良靠时文评选和刻书获得大量财富,不必再求仕进,这也是吕留良放弃诸生后崇德吕家还能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。吕留良及其天盖楼书局刊刻的时文评选图书主要有《天盖楼偶评》《天盖楼制艺合刻》《十二科小题观略》《十二科程墨观略》《唐荆川先生传稿》《归震川先生全稿》《陈大樽先生全稿》《钱吉士先生全稿》《黄陶庵先生全稿》《黄葵阳先生全稿》《江西五家稿》《质亡集》等十二种。除了时文,吕留良及其子孙还刊刻、发行了《二程全书》《朱子遗书》《仪礼经传通解》以及《通鉴》《稽古录》等理学书籍。吕留良门人弟子将时文评选中的吕氏评语摘出,按照朱子《四书章句集注》顺序整理汇编为《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》,集中反映了吕留良的朱子学思想。

吕留良的时文评选图书畅销天下,为崇德吕家带来了大量财富。然而,吕留良毕竟是有情怀的大儒,他从事时文评选不单单是为了牟利,还有政治和文化上的考量。他在《与董方白书》中说:“选文行世,非仆本怀。缘年来多费,赖此粗给,遂不能遽已。”^{[4]90-91} 清初康熙到雍正年间的士人,有人对他顶礼膜拜、设位祭祀,有人接受了他的“夷夏大防”思想因而掀起震惊一时的文字狱“吕留良案”。康熙十三年(1674),因长子陆定徵将要参加科举考试,陆陇其编了《一隅集》,指导他从事时文写作。陆陇其《一隅集》之“一隅”取“举一隅,以三隅反”之意,共选时文 88 篇,因其“见人家子弟,殚精敝神于时文中,积案盈箱,矻矻穷年,而一切经史皆不暇读,读亦不暇精”,“故择此数十篇授之,且为指点其浅深虚实、宾主反正、提挈照应之法,使其因此扩而充之,则时文之规矩尽是矣”。^{[2]236}《一隅集》编成之后,主要是用于教育子弟及门人,后也曾刊刻发行。

据《三鱼堂文集》等书记载,陆陇其族叔元旂翁、好友周好生等都曾刊刻过《一隅集》,但该书发行不广,未能取得好的经济效益。此外,陆陇其在灵寿县学的“四书讲义”《松阳讲义》也曾刊刻发行,陆陇其族叔元旂翁、好友周好生等也都曾刊刻过《松阳讲义》。但从相关记载来看,《松阳讲义》主要是陆陇其用来赠送门人弟子和友人,未必能够收回成本。时文评选和刻书并没有给陆陇其及其家人带来实在的经济效益,主要用于教授门人弟子和赠送友人,借以增进友谊,传播学问。

(三)关于“务农与治生”

陆陇其、吕留良是否曾经和张履祥那样亲自务农,史料无从记载。陆陇其在《先府君圻记》中提到:“府君少时,家道殷盛,长兄墨涛公又显仕,然处之淡如也。及遭丧乱,家业尽落,徒四壁立,亦不以为意。”^{[2]282} 泖口陆家明末“家道殷盛”,清初“家业尽落”,此中落差,必然与家中生活资料(主要是土地)丧失有密切关联。在《亡弟尚桓圻记》中,陆陇其提到:“弟幼读书未成,辄遭乱离。我与先府君皆糊口于四方,弟独在家,无师友切磋之功,学遂不成。吾先府君家法,子弟不能读书,则当执一业,农、工、商惟所宜,不得为天地间闲食人,以辱祖宗。

故弟既废书,遂习于农,备历艰难。弟性亦淳朴,安之不厌。及予举于乡,捷于南宫,遵守祖训,不敢猎取不义,为父母羞,家贫如故,弟之自食其力如故也。及予为吏江南,不欲变其初心,家贫如故,弟之自食其力又如故也。”^{[2]284} 泖口陆家允许子弟务农、做工、经商,不仅限于读书做官。

陆陇其二弟陆肇熊(字尚桓)一直在家务农,家庭经济状况并没有因为长兄陆陇其地位的改变而有所改变。明代陆杲《平湖陆氏家训》指出:“或服田力穡,或经营商贾,或医卜、训蒙、佣书、工书,虽为小艺,亦可自给。”^{[6]575} 由此可知,务农、经商、处馆、医卜、书画等都是平湖陆氏认可的治生途径,泖口陆家作为平湖陆氏分支,自然也不例外。崇德吕家豪富,家中有很多土地,吕葆中《行略》中记载:“沔阳公(吕相)以赀豪于乡里,偶僦好施。

倭寇逼,出藏粟三巨艘以饷军,又助工筑吕城之半。阮中丞表其阕,曰‘善人里’。”^{[4]197} 吕留良在书信中也有对吕家土地相关情况的说明,如《谕大火帖·三》:“今年田须履亩分别高下,以便冬间取租。此事只在此数日内要行,迟则有刈穫者,无从分别矣。汝弟兄计议,同账上分往一看,计二三日可了。”^[7] 陆肇熊亲自务农,可能是自耕农;吕留良“取租”,当属地主。两者虽都是务农,却有天壤之别。

吕留良在时文评选、刻书、务农之余,还曾行医,著有《东庄医案》。现已无法考证吕留良行医是否为了治生,但在“吕留良

案”结案后,崇德吕家移居东北,吕氏族人中仍有行医为生者。除自己或家人以处馆、书院授徒、时文评选、刻书和务农等诸种方式治生外,陆陇其《治嘉格言》从正反两面论述了士人如何治生:“子弟读书不得进学,或工书工画,或习医处馆亦是不俗。此亦随身一艺,聊可养生。若晓得大算法,人亦有用吾处。”^{[6]53}“人情反复事极变幻,做秀才切不可与公门事,做中证,递公呈。”^{[6]112}

三、陆陇其与吕留良出处及治生比较的历史价值

陆陇其与吕留良的遭遇,有其个体特殊性,也带有群体普遍性。清初士人如何选择出处,是做清廷的官员,还是做前明的遗民,这是一个很重大而又很困难的问题;出处直接关系到治生,由出处连带而来的现实治生是不得不直接面对的重大问题。

就经历过乙酉屠城的嘉兴来说,以陆陇其和吕留良为参照,清初士人按照年龄大致可以分为三辈,前辈士人如张履祥、陈确、曹溶等,生于1610年前后,明清易代时已是而立之年;同辈士人如朱彝尊、陆世楷、陆莱等,生于1630年前后,明清易代时尚在少年;晚辈士人如许汝霖、查慎行、高士奇等,生于1650年前后,多半是明清易代之后所生。

前辈士人中,张履祥,桐乡人,前明秀才,明亡后,绝意仕进,隐居乡里,以处馆、务农为生,晚年在吕留良、何商隐等友人的照顾下,潜心学术,独尊朱子学,开创了清初理学的新风尚;陈确,海宁人,与张履祥皆为明末大儒刘宗周的弟子,明亡后绝意仕进,隐居乡里,潜心著述,晚年身患疾病,仍笔耕不辍,发挥了刘宗周学术中尊阳明学的一面;曹溶,嘉兴人,前明进士,入清后曾任太仆寺少卿、户部右侍郎等职,后因事落职,返居嘉兴,晚年以患病为由拒绝了清廷的博学鸿儒科考试。

同辈士人中,朱彝尊,嘉兴人,早年参加反清复明斗争,失败后游幕南北,后以布衣身份参加博学鸿儒科考试一等,授翰林院检讨;陆世楷,平湖人,顺治三年(1646)拔贡,曾任广东南雄、贵州思州知府;陆莱,平湖人,康熙六年(1667)进士,博学鸿儒科考试一等,授翰林院编修,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。晚辈士人中,许汝霖,海宁人,康熙二十一年(1682)进士,官至礼部尚书兼理吏部;查慎行,海宁人,康熙四十二年(1703)进士,授翰林院编修;高士奇,余姚人,国子监生,与康熙皇帝亦师亦友,晚年入籍平湖,官至詹事府詹事、礼部侍郎。

陆陇其、吕留良和张履祥、朱彝尊、许汝霖等十一人,如以清之官员和明之遗民为标准来划分其主要身份,则陆陇其、曹溶、陆世楷、陆莱、许汝霖、查慎行、高士奇等七人为清之官员,吕留良、张履祥、陈确等三人是明之遗民,朱彝尊前期也是明之遗民,后期则成为清之官员。朱彝尊从明之遗民到清之官员的身份转变,有其作为康熙朝“南朱北王”诗坛领袖等特殊原因,在此暂且存而不论。陆陇其既是康熙朝的理学名臣,又是雍正朝从祀孔庙的理学大儒,在清之官员这一系中最具有代表性;吕留良是雍正皇帝钦定文字狱大案中的首犯,在明之遗民一系中最具有代表性。陆陇其与吕留良是清初嘉兴士人生前经历最为典型的两个,也是身后荣辱最为特殊的两个,他们的出处及治生为探究清初士人的出处及治生提供了很好的案例。

参考文献:

[1]张天杰,姚浩逸.故国与新朝之间的彷徨——清初理学名臣陆陇其的出处抉择[J].嘉兴学院学报,2019(2):5-11.

[2]陆陇其.陆陇其集[M].杭州:浙江古籍出版社,2018.

[3]卞僧慧.吕留良年谱长编[G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3:12.

[4]吕留良.吕留良诗文集:上册[M].杭州:浙江古籍出版社,2011.

[5]陆陇其.三鱼堂日记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16.

[6] 陆陇其. 陆陇其家训译注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9.

[7] 吕留良. 吕留良诗文集: 下册[M]. 杭州: 浙江古籍出版社, 2011: 93.